



王蒙研究

(第五辑)

主编 严家炎 温奉桥

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主办

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
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国海洋大学“985工程”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

王蒙研究

(第五辑)

顾 问 管华诗
主 编 严家炎 温奉桥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干	王 安	尤凤伟	托罗普采夫
朱 虹	朱自强	朱德发	毕淑敏
李 扬	严家炎	吴义勤	何镇邦
余 华	迟子建	张 炜	张胜冰
陈建功	於可训	柳鸣九	南 帆
贺兴安	郜元宝	郭宝亮	顾 彬
顾 骧	袁行霈	高洪波	夏冠洲
黄维樑	黄世中	崔建飞	董 健
韩少功	彭世团	温奉桥	雷 达
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

· 青 岛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蒙研究. 第五辑 / 严家炎, 温奉桥主编. —青岛:
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, 2019.6
ISBN 978-7-5670-2232-4

I. ①王… II. ①严…②温… III. ①王蒙—文学研
究—文集 IV. ①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96408 号

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
出版人 杨立敏
网 址 <http://pub.ouc.edu.cn>
电子信箱 1193406329@qq.com
订购电话 0532-82032573(传真)
责任编辑 孙宇菲
印 制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 170 mm×230 mm
印 张 15.5
字 数 290 千
印 数 1~1200
定 价 48.00 元

邮政编码 266071

电 话 0532-85902469

■ ■ 王蒙讲稿 ■ ■

- 2 道通为一——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 / 王蒙
- 6 我的新疆故事与文学创作 / 王蒙
- 16 已经写了六十五年 / 王蒙
- 18 纪念无可纪念的人生故事(创作谈) / 王蒙
- 19 《南皮·千年文化古县》丛书序 / 王蒙

■ ■ 《中国人的思路》评论小辑 ■ ■

- 23 读王蒙《中国人的思路》 / 郜元宝
- 26 在王蒙先生《中国人的思路》新书出版会的报告 / 杜保瑞
- 31 谈王蒙先生的《中国人的思路》的思想方法 / 朱自强
- 34 读王蒙先生的《中国人的思路》有感 / 薛永武
- 40 在《中国人的思路》座谈会的发言 / 张杰
- 42 继往开来,贯通中西——读《中国人的思路》随感 / 马斗成
- 43 中华文化的别样读本——读王蒙新著《中国人的思路》 / 温奉桥

■ ■ 王蒙新作评论 ■ ■

- 47 问世间情为何物——《生死恋》阅读笔记 / 陈柏中 楼友勤
- 55 王蒙的狐步舞 / 贾想
- 58 守望爱情——评王蒙中篇小说《生死恋》 / 崔建飞
- 64 百年中国镜像史——评王蒙新作《生死恋》 / 田晓雨
- 72 关于《生死恋》的对谈 / 刘静 等
- 95 网友评说王蒙新作(九则)

综合研究

- 100 一个历史“跨界者”的形象“代言”
——王蒙“自传性小说”中的自传形象与“代际”书写 / 孙先科
- 113 一个人的舞蹈
——论王蒙精神个性与小说创作之关系 / 李萌羽 温奉桥

王蒙诗歌研究

- 124 “遐思”的野狐禅——重读王蒙的组诗《西藏的遐思》 / 王军君
- 131 一个小说家的心曲——读王蒙的旧体诗《秋兴》 / 胡健

陈德宏王蒙研究小辑

- 137 青山未老——论当代文学中的“王蒙现象” / 陈德宏
- 159 王蒙创作的“加速度”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意义 / 陈德宏

青年工作坊

- 163 当代文学史视阈下的主体性探索
——浅析王蒙《活动变人形》与《青狐》 / 姜尚
- 176 论王蒙 80 年代小说的诗化特色 / 祁昭昭
- 184 流淌在音乐中的小说——试论王蒙《如歌的行板》 / 徐君岭

史海钩沉

- 192 说说 1978 年王蒙给周扬的信 / 徐庆全
- 197 关于《王蒙自传》 / 肖建国

左右看王蒙

- 205 王蒙:不仅仅为了文学 / 朱伟
- 219 让乡情升华为一种哲思——我读王蒙先生 / 刘桂茂
- 223 七律·贺王蒙先生创作六十五周年 / 杜中伟

王蒙的 2018

- 225 盘点 2018 / 王蒙
- 226 王蒙先生 2018 年文学活动述要 / 张彬

学位论文选载

- 232 略论王蒙小说创作与欧美现代主义文学 / 杨笑



王蒙讲稿

道通为一

——从传统经典看中华文化的特点

王蒙

“道通为一”这句话来自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，“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恠憭怪，道通为一”。意思是说，细小的草棍和一个大柱子，一个丑陋的人与美女，宽大的、畸变的、诡诈的、怪异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，从道的意义上讲，都是相通而浑一的。与其他中国古代圣贤相比，庄子很强调“通”的概念，给人印象很深，颇值得思考。

我为何要找出这么一句话来谈呢？现在很强调传统文化，但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广泛了。我曾听过一件事，一批教授去访问美国，美国的听众问，你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可以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博大精深的吗？一位教授回答：博大精深，又博、又大、又精、又深，这怎么能说呢？这样的“不可说”未免令人哭笑不得。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爱好者，一直在思考，我们中华文化能否从整体上，从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上，概括一下？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谈传统文化？我抱着向读者求教的态度，来试着谈一谈。

中华文化的理想追求

首先，我认为，在中华文化中，最突出的理想是“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”。《礼记》里说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”。无论是过去，还是现在，我们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坚定。

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，还有一个是“无为而治”。“无为而治”是老子的话，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。《论语》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孔子说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能够做到无为而

治的,不就是舜吗?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,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,向着太阳,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。老子说,“太上,不知有之”,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,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、符合他人利益、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,就好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,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。而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?老子说,“其次,侮之”,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。所以,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:“功成事遂,百姓皆谓我自然。”事情办好了,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,是自然而然的。老子还有更深刻的一句话,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之心为心”,这强调了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。

尚德 尚善

中华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。比如治国平天下,依靠的是文化、道德、仁爱,实行的是仁政,道德上有示范作用,才能得民心、得天下。它号召用道德、仁爱、善良等来治理国家。而人的道德与善良从何而来?《孟子》里说,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”。孟子强调,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。老子也说,“能婴儿乎?”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,要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,善良纯真。古之圣贤认为,人性是善良的,都会自觉地不做危险的事情,所以执政也需要宣传仁爱的政策,才能得民心,而民心就是天道,符合民心,也就是符合了天道。

在中国古代文化中,天是一个笼统而复杂的存在,对于“天”这个概念,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,而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。总的来说,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,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。天即道,道是没有名称的,既是本体,又是方法;既是精神,又是物质;既是起源,又是归宿;既至大,又至小、至微、至精;既是正面的,又是反面的。所以天的概念,既是哲学的概念,又是道德的概念,还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。这样一来,中华文化就出现了一个景观,把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统一起来了;把天性、人性、为政、道德、信仰、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。从这一点上说,我们可以理解,中华文化很大的关键就是崇尚道德、崇尚性善,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,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仰。当然历史上也有“性善”与“性恶”的争论,但在事实上,性善的观念长久以来已经被老百姓所接受,已经深入世道人心,所以某种意义上,它从思想变成一种信仰,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“诉诸天良”。

尚一 尚同

中华文化还讲求尚一、尚同。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,有这个概念——通了之后要同,通就是同,同就是通。道通为一,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,其实是同一种道理。尚一、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一元论,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。老子讲: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”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。”孔子说: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孟子说:“(天下)定于一。”中国人还爱讲“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”……看到了一,也看到了多,看到一与多的转换,强调掌握一以后,什么都解决了,所谓“一通百通”。

孟子认为,实行仁义其实是很简单的,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。实行仁义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,实行仁义就好像为长者折枝,只要把树枝掰下来就可以了。到了王阳明那里,强调知行合一,认为只要安了好心,就可以干好事。而在孙中山那里,又强调“知难行易”,这是因为他看到,很多关键问题的解决,先是需要改变观念。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,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,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,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,甚至算是幼儿教育。但是黑格尔不知道,中国恰恰是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,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法。

中庸之道与穷通变化

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。国家太大,治理需要依靠精英,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,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“中庸”,孔子说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”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,既不要过于峻急,也不要过于迟缓,应当恰到好处,掌握分寸,留有余地。《论语》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。孔子说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。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,但他只是说“如浮云”,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,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,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。在孟子的时代,认为精英就当如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。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,他强调有至人、有真人。

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“化”的观点,《周易》说“穷则变、变则通、通则久”。什么事情碰到钉子,无计可施了,这就是“穷”,穷就要变,变了才有出路,才可维持下来。到了庄子的时代,更喜欢用的字是“化”——与时俱化。“化”与“变”相比,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。所以,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、一和同、天下定于一、吾道一以贯之,似乎很呆板。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,

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。孟子说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如果没有条件，我就把自己管好了；如果有条件了，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。孙子说：“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。”充分理解战争的人，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。孟子评价孔子，说他是“圣之时者”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，民不聊生，国无宁日，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、把握分寸的话，他早就灭亡了。

在中国，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。老庄主张以退为进、以弱胜强、以无胜有。老子甚至主张，柔弱是生命的特色，坚强是死亡的特色。当然，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。但从侧面说明，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。20世纪后半期，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，西方的一些政要，比如撒切尔夫人、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，而上述这些人却说，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，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，该坚持的继续坚持，该改革的就改革，化之于无形。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，只有中国。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，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、变化的能力，统筹兼顾、面面俱到的能力，世界上罕有其匹，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。

如今，我们更可以在中华文化和资源的基础上，按照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时势，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推动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，建设我们美好的生活，实现我们的中国梦。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2018年7月17日）

我的新疆故事与文学创作

王 蒙

关于新疆故事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,有些背景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说它。我挑几个事说一说,再谈一谈我对文学的看法。

1959年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,连续有几年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,粮食的供应发生了问题,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,1962年情况有一些好转。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,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,提出了两条道路、两种制度、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,而且有时是很激烈的。

那时候我经过了一段曲折,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,现在这个学院就叫首都师范大学。1963年的时候,我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反修学习时,遇到了一些省市的文联作家协会的领导,就谈到我的一个愿望,我说想离开北京,到地方上看一看、走一走。

为什么我当时有离开北京的想法呢?虽然我当时在大学里教书,状态不错,但是整个北京的工作气氛、政治气氛我很难理解,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、反修等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很难掌握的。我很尊敬大学,但是我追求的不是当一个大学的老师,我追求的是文学创作。

当时有几个地方都表示欢迎我去,我选择了新疆。我选择新疆有一个原因,觉得新疆的事情跟内地不完全一样,我比较能够找得着感觉。因为我完全相信新疆最中心的问题是祖国的统一、民族的团结,是爱国主义,关于这个东西我容易掌握。当时中苏关系也非常紧张,还有保卫边疆、发展边疆,这个东西容易掌握,可是其他的我掌握不了,所以就选择到了新疆。

这些情况我不再过多地交代了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,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。中国古代,尤其在明朝以后,有一个很时兴、很流行的说法,最早是戏剧家李渔在他的小说《十二楼·思过楼》里提出来的,叫大乱避乡、小乱避城。政治性动乱要往乡下躲,小土匪之类的动乱往城里走,这是中国人总结的乱世经验,我的选择符合了这样一个经验。

在整个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过程中，我个人在新疆安然无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我见到一些老朋友的时候，他们都认为发生了奇迹。因为我如果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的话，起码会被打折两条腿。我的处境那种情况之下不好说。所以我总结出，我在一个并不快乐的时代选择了一个当时最快乐的去处。这是我说的第一点。

第二点，我在新疆过了一年后形势进一步紧张，但是新疆的人对我很好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都对我好，他们挖空思想了一个主意，觉得我在乌鲁木齐待着目标太大，就让我去农村条件最好的地方去劳动锻炼。

中文是非常伟大的，“锻炼”一词，太好了，每天早上跑步也是锻炼，游泳、爬山也是锻炼，而我到了新疆，在人民公社担任副大队长，属于副股级村干部，给了我很多机会、给了我许多新的经验。

这里只说一个细节，我在伊犁农村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，而且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，住一个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那里有一个土炕，我躺在那儿就可以睡觉了。那个门是歪着的，故意留了一个口，也真是可爱，这样燕子可以飞到房间里去。

我进去没有几天就来了两位燕子朋友在那里做窝，后来小燕子就出来了六七只。早上六点钟，小燕子和它们的父母就开始家庭联欢了，吵成一团。然后这个村里的农民就说，王蒙先生是一个好人，这间房子已经有七年没有燕子来做窝，但是他进来几天燕子就来做窝了。

这个说法科学不科学我实在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办法把这个经验报告给中央组织部，用一个干部住的那间房子有没有燕子做窝，来衡量他是否善良。但是我想老百姓有想法不是坏的想法，我不能说从燕子做窝这件事情说明我有多么可爱、多么忠诚或者多么伟大，但是我没糟践过这些小动物，没有威胁过这些小动物，我和这些小燕子成了朋友。到现在我想起这一家燕子仍然很感动。这一家燕子就陪伴我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、一个陌生的民族、一个全新的生活的经验。

燕子这一家还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。有一天我忽然看到有一只小燕子掉到地上了，我就把这只小燕子拿起来，再把它放到那个窝里。我往窝里一放，没过几分钟，那只小燕子就又被扔地上了，那只大燕子对我怒目而视。我这才明白，小燕子病了，不可能给它打抗生素，病了只能把它淘汰，免得使这一个窝的燕子都受感染、受伤害，所以这只燕子给了我一个教育。仅仅有仁爱也是不够的，还要有原则，还要防止危险，还要警惕不测，还要清洁环境，还要当机立断。

这是我说的燕子的故事,是我在新疆最快乐、最离奇的事,如果不是新疆的少数民族,没有人能理解这样一个事情。我在那里待下来了,非常认真地实践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说法,他说知识分子要见世面,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。我觉得我有一个结合的好机会了。

我首先从学习维吾尔语开始。我开始用维吾尔语来背诵语录,用维吾尔语来背诵“老三篇”。有一天我正在大声朗诵《纪念白求恩》的时候,有一个房东老太太来敲窗户,看看谁在朗诵,我说是我啊,她说还以为是广播员,讲得这么字正腔圆,这么好。这样我也就认识了当地各种各样的人。其中有一个人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校的干部,他请我到 he 家里坐一坐,说多坐一会儿,待会儿有重要的客人来。过了一会儿,来了一个人,穿着大衣,因为深秋了,很冷了,东张西望进来,像汽车或者火车上的那种西北的贼娃子,就是小偷。他拿着一个瓶子,写着“药用酒精,禁止内服”。他说,今天我们三个人的任务就是喝掉这瓶酒精。我说,药用酒精不能喝。他说没关系,我已经喝了三年了。党校的朋友跟我说他就是反修医院一个科的主任。当时我们就喝起来了,喝了三巡以后他一拍桌子,说你们知道老王是什么人吗?党校的老师就说,他是一个写作的人。他非常激烈地说,他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。我说“不是不是”,我当然不是。然后内科主任说,王先生,不要害怕,不要退缩,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就是得了,不怕。党校那个朋友一听说我得斯大林文学奖也一愣,愣了大概五到六秒钟突然就明白了,心有灵犀一点通,说没错,他就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。

于是我也开始有点模糊,我是不是得了斯大林文学奖?我自己也忘了?自己不敢承认了?他们两个当时证明我是得了斯大林文学奖,我不能再否认了,再喊这两个人就闹起来了,整个党校的人就都来了,传出去以后就变成我冒充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。他们再往前推一步,说老王不但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得者,而且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接见,《真理报》刊登过,还是头版,而且他家里一直有这个照片,后来由于他老婆不懂事把这个报纸弄丢了……两个人说得跟疯了一样。几十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,撒酒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见得多了,但是能到这个程度,实在不多。一直到50多年以后,我见到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维吾尔族领导同志,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,他听了以后也觉得可笑,他说他们俩喝多了酒,就当上了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会主任了,你就算是在那一天在新疆荣获伊犁土产的斯大林文学奖啦。这不是在一个不快乐的年代,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了吗?

不要小看这个事情,当时中苏关系很坏,苏联否定斯大林中国不否定斯大

林，斯大林文学奖早已没有了，苏联当时又设了列宁文学奖，他们不说我获得了列宁文学奖，而说我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，这是政治正确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他们很有头脑。

我想在“文革”已经发生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有这样浪漫的遭遇了。而且即使在新疆，即使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，我又开始了写作。《这边风景》的写作受当时时代许多影响，但是在写到生活的时候，有人过誉地称赞它是维吾尔族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因为我完全和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文学就是对生活的爱，对生活的记忆和留念。全世界都用流水象征表示时间，正因为它是逝水，希望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很重要、很美好或者是很不美好，但是非常思念着美好的时光，希望把这种经历留下来，这就是文学。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有所命名，这就是文学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我小的时候看到月亮，对月亮的感觉没法表述，它也很亮，但跟太阳不一样。我一生看到的第一本书叫作《小学生模范作文选》，它选的第一篇文章叫《秋夜》。《秋夜》第一篇文章是“皎洁的月儿在夜空升起”，我一下子就觉得月亮离我近了。从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期，看到天上的月亮就想起“皎洁”，那时候没有什么雾霾，所以那时月亮非常亮，看到的月亮就是“皎洁”的。生活是非常可爱的，生命是短促的，但是人们仍然愿意体会这种生活，愿意记载这种生活，愿意命名这种生活。

我还喜欢一个命题，爱情和爱情诗，喜欢探究它们之间是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和互相影响的关系。当然从唯物论说是先有爱情后有爱情诗，没有爱情哪来的爱情诗？我们又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爱情诗、没有爱情文学，那爱情剩下什么了？当然你有这种相喜悦的情感，然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，也有一些庸俗的内容，而正是爱情的文学、爱情的诗，让你一下子把爱情理想化了、审美化了、文明化了、道德化了，而且永远难以忘记。所以对于具体的一个人来说，很可能是爱情诗在前，爱情在后。因为你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就读到爱情诗了，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5岁的时候就读到了或者8岁的时候就读到了，你当时并不懂，但是在你的脑子已经播种了诗意的、美好的种子。有这种诗意美好的种子和没有诗意美好的种子完全不一样。

我在新疆的时候是困难时期，内地的粮食供应太困难，有人就跑到新疆去。我见过一个小伙子给内地原来的农村里的女孩子写情书，他写情书不停地在背诵当地的民歌、小曲和地方戏里表达爱情的东西，什么“哥是天上一片云，妹是河里一条鱼”，他就是背诵那些，来表达他的情感。我读《阿Q正传》，遗憾的不是阿Q革命不成功，是他觉悟太低，最后死都不知为何如此下场。我对阿Q遗

憾的还有他对吴妈的追求的失败。因为他跟吴妈本来挺合适、挺好的,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跪下来,说“我要和你困觉”,这是绍兴话。于是他就变成了性骚扰,吴妈要上吊,阿Q几年的工钱都被没收了。相反的,他如果有一点文学的修养,他对吴妈产生了好感,本来可以背徐志摩的诗,“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,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……”他不懂徐志摩,如果他知道温州的琦君呢?也会好得多,虽然我也不知道琦君有没有爱情诗,但是至少他语言会美丽得多,至少会躲开性骚扰。所以文学不但能表达你的思想感情,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,文学可以使美好更加美好,文学还可以使很多的不美好,甚至在对不美好的描绘之中表达美好。

我也读过一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,有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表达一种思想感情,说男人是靠不住的,男人一个好人也没有,不要信男人的话。但是恰恰在这样的描述当中,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女生、我们的女作家多么希望有好的男人,多么希望他们既潇洒又真诚,既有才华又有担当、负责任,她们希望有真正能够对得起女子痴情的这样的好的男性,有幸福的生活。文学当中表达出了人民对情感的这种向往,对于道德的这种向往,对于理想的这种向往,哪怕是有许多的抱怨、哭泣、诅咒、愤怒、呼冤,在这样的过程中仍然表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赤诚和追求。

所以我还有一句话,文学有它批判的功能,这是毫无疑问的,文学作品中会表达出人们对生活的不满意,但是归根到底作家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,我宁可认为作家是世界的期盼、世界的情人,作家对世界有很高的期盼,有很美好的期待,当他看不到、得不到的时候才会有那么多的叹息、痛苦、失落。所以不管你有多少叹息、痛苦和失落,你要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好的期盼。

我今天就讲到这里,接下来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,你们问什么都可以,但是我听力有下降,所以你们问完了以后请李辉先生解释一下。

现场观众提问

问:请问您对中国传统中“孝”字的理解,它是否是人与生俱来的应有的本性。

王蒙:我想孝是人的本性,这一点也正是儒家的学说。儒家学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,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别,他们追求把天道、天地同时与生俱来的这样一个道理,这样一个道德,这样一个原则和人的本性、人性和教化,叫王道,要把天道、人性、王道三者统一,成为天下的教化。

把这三者结合起来,把自然、信仰、政治结合起来。尤其孟子,明确地主张

人性善，因为人本来应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。孔子讲孝悌本来就有的，对父母有孝，对兄长，他很少谈姊妹，按我们现在，对兄长、姊妹都应该有悌的感觉。孔子认为一些政治的、社会的价值标准是从孝悌产生的，既然你对父母是很孝顺的，将来到社会上对长者、对领导、对大臣，就像对待父母一样。那么既然你和你的兄弟姊妹是友爱的，那么到了社会上，你和你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同乡，和这些横向打交道的人你也应该是友爱的，所以他把孝的意义提得非常重。

但是老子他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，既然孝悌这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，用不着在那没完没了地讲，老子喜欢逆向思维，他说家庭不和有孝慈，本来你孩子很孝顺就不需要天天讲孝顺，国家出了乱七八糟的事，这时候要强调谁是奸臣、谁是坏人，谁是忠臣。老子对孝有自己不同的看法。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 consistency，它强调人心和天心的一致性，人心从哪来？是从天来，天是物质，是精神，又是自然世界，他对天的理解这几个方面都有。这是传统文化的特点。

我们也可以从别的方面找到例子。孝这个字在国外是没有的，但如果我们认为外国人就都是对父母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人，这个不符合实际情况。外国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，确实有很孤单的父母，有被子女所冷淡的父母，但是我也见过对子女特别好的父母和对父母特别好的子女。

问：您能谈谈《这边风景》吗？

王蒙：《这边风景》曾经尘封四十年。你不管这个书里面有什么预设的或者不能不预设的政治主题，但是这是长篇小说，你写的是生活，写的是家庭，写的是男女老少，你写的是各种不同的民族，你写的是风霜雨露、衣食住行、春夏秋冬。

《这边风景》不管在人民公社时期写的也好，成败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写出活人，你能不能写出生活来，你能不能写出性格来，你能不能写出那种生活的魅力来，包括生活中的艰苦、困苦，生活中的意外，生活中受到的恶势力、坏人的反面的影响。而我如果说对于尘封这么多年的作品还有点信心的话，因为从年龄来说，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是 39 岁到 42 岁，此期间从生理上来说应该是写作能力最强的时候，在细致地描写人们的内心、言语、行动，他们的说话、对答、场景上，在描写的细致和生动上，是别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。

这里头我顺便谈一个问题，中国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，孔子曾经讲，“诗三百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”。什么叫思无邪？怨而不怒，对某些事有所不满，但是不愤怒，因为愤怒就站在对立面了。还有哀而不伤，它很悲哀，你写到聚会就会写到离别，你写到生的美好就会写到死的悲哀，你写到丰年也会写灾年，你写到好人也会写到坏人，所以要哀而不伤，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心理状态，而仍然

是建设性的心理状态。然后是叫乐而不淫,但是不乐极生悲,不使你的欲望泛滥,这是孔子的说法,其中还有孟子补充的说法。有的时候你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对这些说法并不欢迎,因为文学里面可以各式各样,文学里面可以有夸张,可以达到极致,不一定适可而止,好了还要再好,怒了还要再怒,允许极致。

人们对文学的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成败。我过去认为文学有很多附加的要求,不是,不同的人都有对文学各种各样的看法。其中最有趣的是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穆克写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,我现在问一下咱们在场的朋友读过的请举手。呵,没有。它里面讲什么?尤其以波斯为代表,有发达的细密画,因为细密画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细密画是二维空间,有点像中国国画,就是它没有立体性的表现,他们认为细密画里表达的不是人眼睛所看到的世界,是真主的眼睛里的世界。大家回去网上一搜几百张就出来了,完全另外一种风格。这个画里面没有肉欲、没有罪恶,只有高洁、只有美丽,连里面的马都是能飞的,它用很特殊的要求发展变成这么一派艺术、一派文学。所以真正的天才、真正的艺术家,这也是我喜欢说的话,他有一种免疫的力量,他的作品里充满着艺术的感受和才能。而各种似乎是外加的要求,也能与特定的生活状态相结合,被天才的艺术家消化,而成就一种特殊的灵感与契机。比如说李白《清平调》,是他奉旨写杨贵妃的,包括三首词。你如果从他的处境上来说,奉皇帝之命现场给杨贵妃作诗,你可以用很负面的评语去说李白,但是这个也展现了李白的才华,表达出唐代的美女风度、魅力,体现了在李白人生一度的高峰上他所受到的赏识,依然是不朽的。

尽管《这边风景》是在“文革”那种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写的,但是依靠了我独有的对新疆农村的生活、对少数民族的生活,对少数民族心理、思想、情感,以至他们开玩笑的方式、说话方式的烂熟于心,成为不可多得的作品。我可以这么说,《这边风景》所有的对话我都是用维吾尔语先构思。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词,说“有多少办法呢?”汉族没有“用多少办法”,我们会说“有什么办法”“有什么主意”“没辙”,维吾尔族问的是“你有多少办法”,而不是“有没有办法”。如果他是维吾尔族人,他一看这个就知道。所以人的经验、人的知识、人对生活的体会、人对生活的热爱和拥抱,这对作品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。

女作家毕淑敏有一句名言,有时候政治歪曲了生活,但是生活又消解了脱离实际的政治。就是你即使是按照政治的要求来写的,有这方面的成分,但是你对生活的热爱、你对生活的体会和熟知,你写的这种活生生的人和事就会出现,仍然能有自己的创造与价值。